苏州镇名的文化地理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武一帆，孟召宜

（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徐州 221116）

摘要：以苏州市镇名为研究对象，整合地名录、地方志及多源空间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核密度分析等，系统解析镇名的类型构成、空间分布与文化地理特征。结果显示：镇名以水文要素为主，建筑、经济与人文历史要素共同作用，形成多元复合结构；空间上依托水网集聚，沿交通廊道延展；文化地理特征集中体现水乡环境、建筑景观、漕运经济、吴文化价值及宗族与移民历史记忆。分析表明，镇名文化地理特征的形成受自然环境、工程建构、经济积累、文化内涵和社会动力等多种因素驱动，反映出明显的人地互动与区域文化景观特征。

关键词：苏州镇名；文化地理特征；空间分布；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K901；K92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4－0198－09

地名作为融合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地理标识，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地理信息[1-2]。从地名文化内涵来看，地名作为文化与空间的交汇点，具有包容性，集中反映了自然环境[3-4]、人类活动[5-6]与历史变迁[7-8]的多重特征，同时揭示其生态特性、时代演变规律及历史更迭的内在逻辑[9]。从政治需求角度看，地名变迁反映了统治阶级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协商与文化共识，既体现不同政权阶段命名倾向的变化[10]，又展现了地名作为稳固政权象征的文化符号作用[11-12]。从学科视角看，近年来，地名文化研究逐渐渗入地理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学者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定量化分析地名分布特征[13]、结合方言与语义探讨命名规律[14]，或者以历史学视角梳理地名演化[15]，揭示其与政权更迭及自然变迁的关联[16]。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镇名”与“街道名”在行政层级与治理属性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结构上均由“专名＋通名”构成，其中专名是地名文化内涵的核心载体。从专名视角出发，两者在反映地域自然环境、历史记忆与社会文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尽管街道名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现代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但其专名多承袭既有地名体系，延续了地方文化信息。因此，本文以专名为分析核心，将镇名及部分转化为街道的地名纳入统一考察框架。在此基础上，当前跨学科地名文化研究仍相对不足，不同学科研究路径较为固化，关于镇名的系统性研究也较为匮乏，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8]，缺少对普通乡镇及消失地名时空演化的综合探讨。与此同时，苏州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先导区，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17]，镇级建制不断调整，镇名数量明显减少，部分地名以街道形式延续。基于此，本文以苏州镇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消失与现存镇名的文化地理特征及形成机理，以期深化对区域文化内涵的认识。

1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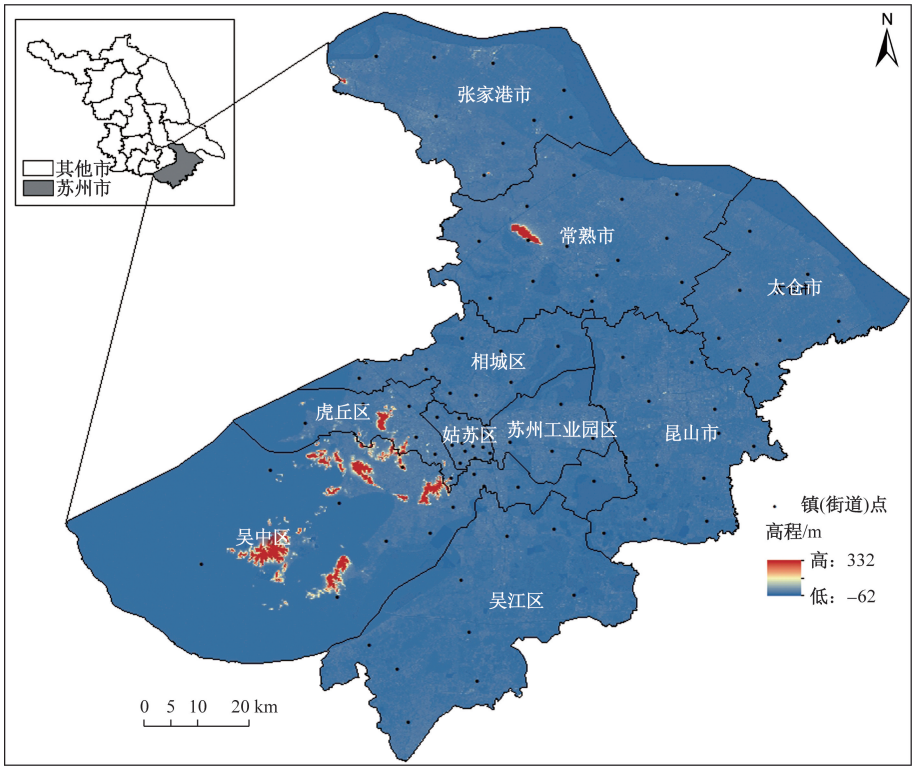
1.1 研究区域概况

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图 1)，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作为苏南经济重心，通过“市管县体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乡镇合并”等措施加速城市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水乡镇、古镇、农业主导的乡镇逐渐被新的城市规划取代，适应城市发展的街道数量增多，部分镇名文化逐渐弱化甚至消失。2023 年末，苏州共有 5 个区(姑苏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吴江区)及苏州工业园区和 4 个县级市(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共辖 51 个镇和 46 个街道。

收稿日期：2026-03-26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课题(24SFZB-03)；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2025XKT10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YJAZH061)

作者简介：武一帆(2000—)，女，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通信作者孟召宜(1971—)，男，江苏睢宁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与区域发展。



审图号:GS(2024)077 号

图 1　研究区域

1.2　数据来源

镇名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一是文献资料,包括 1986 版《全国乡镇地名录》和 1998 年《苏州统计年鉴》,结合苏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排除重复后获得镇(街道)级地名 207 个;二是在线地名数据库,通过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https://dmfw.mca.gov.cn/index.html)及博雅地名网(http://www.tcmap.com.cn/),用于收集镇名文化内涵;三是空间数据,包括苏州市行政区划底图(来源于苏州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现有乡镇坐标(通过 Google Earth 获取)及区域高程数据(地理空间数据云)。对于已消失镇名,由于缺乏坐标信息,参照 1986 年及 1998 年行政区划图,并利用 ArcGIS 手工绘制矢量数据。

1.3　研究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和资料,梳理镇名文化内涵。对于文献中未明确记载的镇名,结合在线地名查询工具进行补充,形成相对完整的苏州镇名数据库。以自然景观类和人文景观类为分类依据,对 207 个镇名进行统计整理,明确数量结构及类别分布。利用 Google Earth 获取具有坐标信息的乡镇点位,并导入 ArcGIS 软件,绘制核密度分布图[6]、分类设色图、叠加分布图[16],呈现镇名空间分布特征。

2　苏州市镇名用字构成状况

2.1　苏州镇名的总体特征

2.1.1　镇名用字情况

苏州市镇名用字可分为自然景观类和人文景观类两大类,具体涵盖水体、地形地貌、植物、建筑交通、经济活动、人物姓氏、美好祈愿、政治军事等 8 类。自然景观类出现 38 个用字、频次 91 次,以“塘、湖、溪、浦”等水体字和“山、石、陵”等地形地貌字为主,植物类如“芦、梅、茜”次之;人文景观类出现 83 个用字、频次 146 次,以“桥、亭、塔、寺”等建筑交通字和“陆、杨、陈”等姓氏字最为常见,美好祈愿类如“福、德、乐、丰”用字较少(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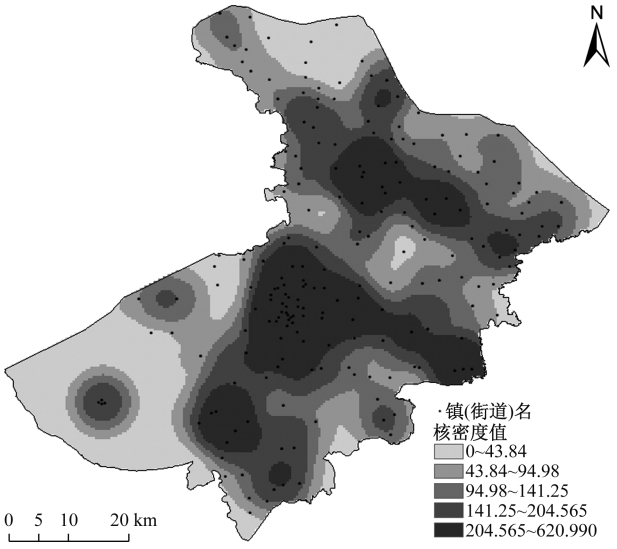
2.1.2　镇名空间分布情况

根据表 1 数据,绘制了苏州镇名的核密度分布图和分类设色图。统计中涉及 1986 年和 1998 年的镇名,为保持地理位置一致性,消失的镇名被放置于历史相应区划单元进行分析。

从自然要素类镇名的核密度分布来看(图 2 和图 3),其空间差异显著。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偏南及中北部地区,形成明显的团块状核心,如太湖中部和阳澄湖中间位置;大运河沿线及周边呈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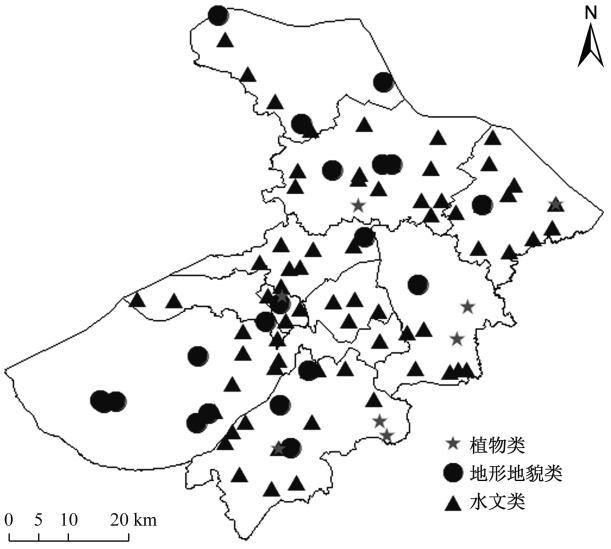
表 1　苏州市镇名用字(词)分类

类型	具体小类	主要用字	用字数/个	频率/次
自然景观类	水文	塘、湖、溪、浦、河、湾、泽、海、浜、泾、渎、港、江、淀、川、渠、淼、泉、曲、漾、渚、口、角	23	63
	地形地貌	山、石、陵、平、沙、坪、低、泾	8	20
	植物	芦、茜、梅、梨、菉葭、桃	7	8
人文景观类	建筑工程	桥、亭、塔、门、寺、路、街、园 坊、府、堂、闸、渡、庙、港、埭、堰、坝	18	59
	经济活动	集镇、市、钞、金、巷、港、铜、冶塘、坊、丰、兴、玉	14	31
	人物姓氏	盛、梅李、董、陈、杨、周、陆、张、赵 徐、唐、任、谢、王、瞿、毛、金、庞、元、胥、归、蠡	23	29
	美好祈愿	太平、福、积德、乐、丰、新、兴 晨阳、秀、义、蓬阆、万平、莘、东来、九曲	22	19
	政治军事	关、都、厢、府、兵、屯	6	8



审图号:GS(2024)077 号

图 2　苏州自然要素类镇名核密度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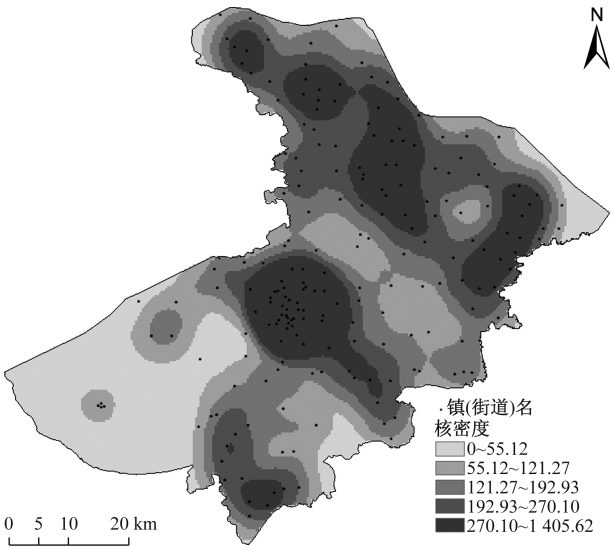


审图号:GS(2024)077 号

图 3　苏州自然要素类镇名分类设色图

状分布。整体呈现“高密度聚水系、中密度分散次级资源、低密度镶嵌其中”的格局。其中,水文类镇名分布最广,沿太湖、阳澄湖及京杭大运河密集集中,尤以苏州南部和中部水网发达区为主;地形地貌类镇名多见于北部和西部丘陵区,分布零散;植物类镇名最少,零散分布于西南太湖沿岸及中北部地区,呈点状分布。总体表现为“南多水名、北多地貌、西南少量植物名”。

人文要素类镇名的空间分布同样不均衡(图 4 和图 5)。高密度区主要位于中北部及西南部地区,尤其在江南六大古镇附近,形成极核聚集;中东部地区也呈团块状分布。建筑类镇名集中于市区及古城周边,凸显历史文化积淀;经济类镇名沿东南部交通干线和产业带分布,如昆山、吴江;姓氏类镇名在北部太仓、张家港、常熟较集中;美好祈愿类镇名零散于中部和西南部局部。整体空间格局可概括为“建筑名集中城区、经济名沿产业轴、姓氏名北部显著、祈愿名零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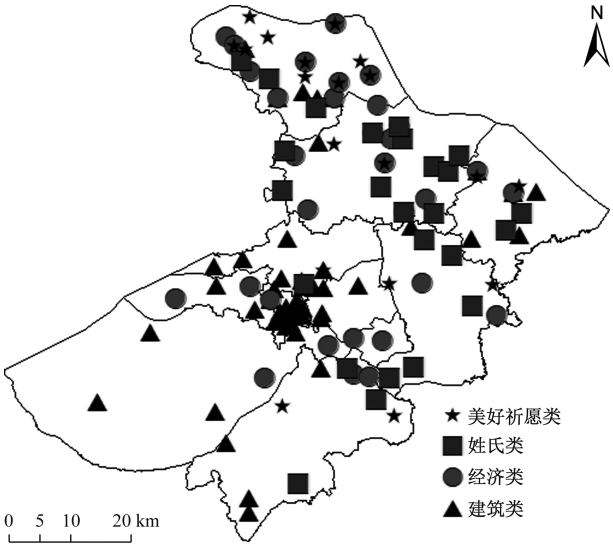


审图号:GS(2024)077 号

图 4　苏州人文要素类镇名核密度分布

2.2　苏州镇名的类型构成

基于命名缘由,将其细分为 10 种类型(表 2),如水文要素、建筑交通等。部分镇名因多重因素重



审图号:GS(2024)077 号

图 5 苏州人文要素类镇名分类设色图

表 2 苏州市镇名构成分类

类别	数量/个	占比/%	镇名示例
以水文因素命名	63	22	金鸡湖街道、越溪街道、太湖街道、临湖镇、木渎镇
以建筑工程命名	59	21	枫桥街道、通安镇、长桥街道、唯亭街道、光福镇
以经济活动命名	31	11	浒墅关镇、横泾街道、郭巷街道、甪直镇、同里镇
以人物姓氏命名	29	10	任阳乡、梅李镇、董浜镇、杨舍镇、蠡口乡
以人文历史命名	23	8	八坼街道、黎里镇、古里镇、千灯镇、三元街道
以地形地貌命名	20	7	狮山街道、香山街道、金庭镇、虎丘街道、凤凰镇
以美好祈愿命名	19	7	太平街道、常福街道、德积街道、乐余镇、南丰镇
以政治军事命名	8	3	震泽镇、七都镇、城厢镇、府前街道办事处、八都乡
以植物因素命名	8	3	黎里镇、陆家镇、千灯镇、芦荡乡、茜泾乡
以其他要素命名	26	9	苏锦街道、新镇乡、城郊乡、沙家浜镇、南郊乡

复计入,如“浒墅关镇”,其名兼具神话传说与政治因素,既源于秦始皇南巡传说,又受避讳影响,因此同时归入神话与政治类别。

2.2.1 *以水文因素命名*

水文要素类镇名数量最多,共 63 个,占比为 22%,可分为三类:一是含“塘”“湖”字者,数量最多,多采用“水域全称+镇”或“方位+水域名”形式,如“斜塘街道”“横塘街道”“太湖街道”;二是含“溪”“浦”“河”“湾”字者,多用“水域全称+镇”形式,如“越溪街道”“张浦镇”“浏河镇”“白洋湾街道”;三是含“泾”“港”“渠”字者,多泛指多河多水之地,如“沺泾乡”“泗港乡”“藕渠乡”。三类镇名体现了水系分布和方位指示特色。

2.2.2 *以建筑工程命名*

建筑交通类镇名居次,共 59 个,占比为 20%,以“桥”“亭”“塔”“门”等字最常见。其中,一部分与水文相关,如含“桥”“渡”“港”“埭”“堰”的镇名,如长桥街道、黄埭镇;一部分含政治元素,如“亭”“门”,如唯亭街道、望亭镇;一部分含宗教元素,如“塔”,如双塔街道、北寺塔街道。

2.2.3 *以经济活动命名*

经济活动类镇名共 31 个,占比为 11%,主要分三类:一是以“姓氏+集/市”命名的镇,如辛庄镇、花桥镇;二是水域与经济复合型镇名,多采用“水域名+经济因素”形式,如泗港乡、塘市镇;三是以港口或官方经济管理机构命名的镇,如甪直镇、冶塘乡。

2.2.4 *以宗族姓氏命名*

以姓氏宗族或纪念伟人命名的镇有 29 个,占比为 10%。主要有 22 种姓氏,进一步细化发现:一部分镇名为一般类型,即某种大姓在此聚集,如西张乡、藕渠乡等;一部分镇名由纪念伟人得来,如胥江街道、任阳乡;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镇名体现了宗族势力,如陈墓镇、盛泽镇等。

2.2.5 *以其他因素命名*

其中,以人文历史事件命名的镇占比为 8%,可铭记历史,如古里镇、锦丰镇;地形地貌类占比较高,以“山”“石”“陵”“沙”等为主,如狮山街道、香山街道、东山镇;美好祈愿类占比为 7%,如德积街道、正仪乡;政治军事类占比 3%,如八都乡、七都镇;植物类占比为 3%,如芦荡乡、桃坞街道;未归类的“其他类”占比为 11%,包括河流、水道、港口形状、组合名及京剧相关,如苏锦街道(因盛产芦苇得名)。

3 苏州市镇名的文化地理特征

区域本性是其他地区无法复制的独有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差异;二是长期积累的人类建造要素,如建筑和道路;三是发生的历史事件[18]。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其语义结构反映了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等价值。苏州镇名也如此,深刻体现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观、历史积淀、社会结构和人文精神,是“人地关系”与文化特征的典型缩影。

3.1　彰显水乡泽国的江河湖湾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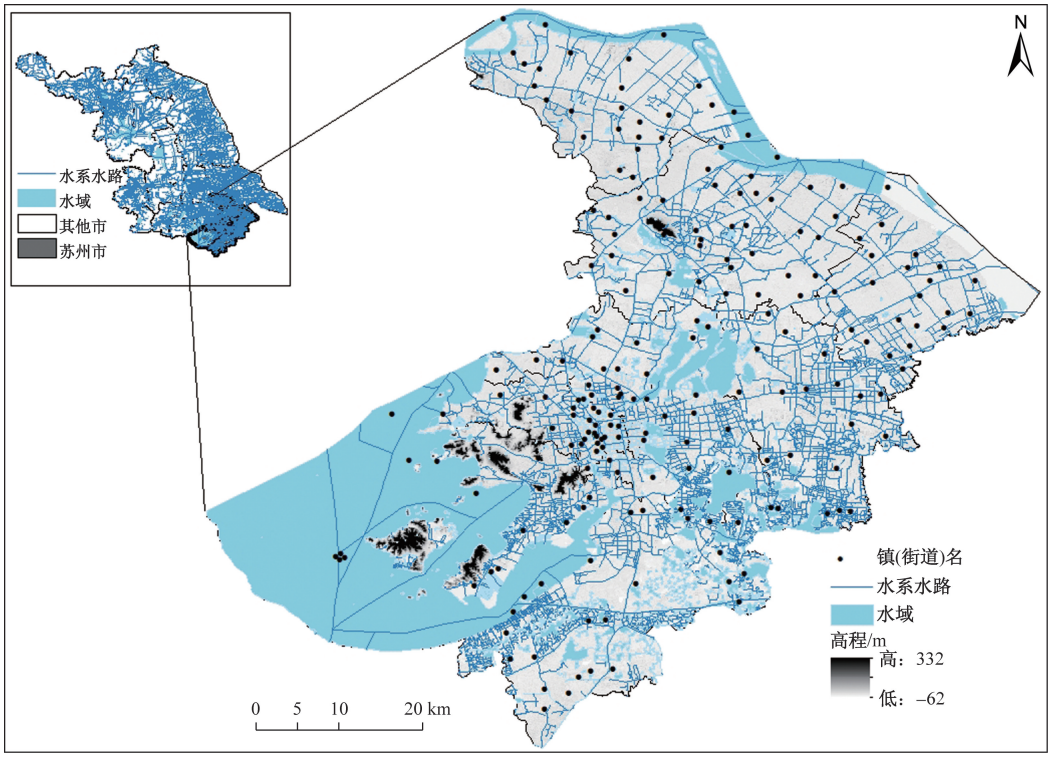
每个地方的第一本性为地方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即第一自然[18]。自然环境是地名文化形成、发展的本底条件[19]。苏州镇名的水文特征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体现核心湖河对聚落生成和布局的塑造作用。例如，“震泽镇”取太湖古称“震泽”，“临湖镇”因濒临太湖而得名，“白洋湾街道”因境内湖泊白洋湾而得名。这类镇名通过“泽”“湖”“湾”等字，直观呈现“靠湖叫湖、靠河叫河”的命名方式，反映太湖及江南运河对聚落形成的重要影响。二是反映河网密布、纵横交错的水文状况（图 6）。例如，“金港街道”因张家港河及多条干河交织成港而得名，“沙洲乡”直接体现港汊密布的地理特征。这类镇名以“港”“溪”“泾”等字记录内河支流繁茂和港埠串联的重要作用。三是彰显水乡地貌及现代性改造影响。例如，“香山街道”因位于香山南麓得名，“平望镇”描绘运河沿线平原地貌，“黎里镇”与梨花相关，“芦墟镇”取材于芦苇，“玉山镇”与特产昆石相关，“金鸡湖街道”以人工湖命名。这类镇名既展现苏州零散低山丘陵地貌及丰富自然资源，又体现现代水利与湖泊改造对聚落布局的影响，而不仅限于传统水文特征。

3.2　凸显建筑景观的桥亭塔门风貌

地方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建筑、道路、城市形态物等人文物理实体，即第二自然[18]。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古代道路网络和水陆交通枢纽相关镇名。例如，“浒墅关镇”取明清钞关得名，“枫桥街道”因枫桥古迹得名，“望亭镇”因历史驿站而名。这类镇名通过“关”“桥”“亭”等符号，反映苏州交通体系及各历史时期核心枢纽的作用。二是宗教、行政等文教建筑相关镇名。例如，“双塔街道”因罗汉院双塔而名，“光福”取光福寺得名，“府前街道”以官府衙署命名。这类地名通过“塔”“寺”“衙”等符号，体现建筑的精神象征与权力地位。三是与古代防御工事或经商闹区相关的镇名。例如，“娄门街道”因古城娄门得名，“跨塘镇”古称娄下镇，为姑苏娄门外第一商埠，“金门街道”因商业闹区而名，同时在历史上承担防御城市和抵御外敌的功能。这类镇名通过“路”“门”“街”等符号，展示古代关隘在军事防御与经济发展中的双重或单一作用。总体而言，这些建筑交通类镇名不仅反映了苏州历史时期交通网络和城市功能的分布，还体现了社会权力、宗教信仰与经济活动在空间布局中的综合影响。

3.3　反映因水而兴的经济发展特征

苏州地理位置优越、漕运经济发达，依托丰富自然资源和传统手工业，其经济特征逐渐映射于镇名命名中。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体现因水而



审图号：GS(2024)077 号

图 6　苏州市水域及高程

兴、因商而盛的区域特征。例如,“泗港乡”因港口交易形成集市,“塘市镇”因市场而得名,“周行乡”因集镇而名。这类镇名通过“港”“市”“集镇”等字,直接呈现漕运、仓储和集市功能。二是反映地方产业特色。例如,“车坊乡”因油车、糟坊等传统产业得名,“冶塘乡”因冶铸业而名,“同里镇”因富土而名,通过“坊”“冶”“铜”等字,展示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方式。三是传统与现代镇名形成时空对比。例如,1950 年的“福山乡”源自传统集镇,1962 年的“石路街道”源于近代商业街,2021 年的“金港街道”因张家港港得名,体现资本积聚与财富象征,反映城乡经济在命名上的时代差异。四是寄托经济发展愿景。例如,“兴隆乡”表达乡村振兴,“大新镇”寓意年年更新,这类镇名通过“兴”“新”“丰”等字展现对经济腾飞的期许。总体而言,这些经济类镇名不仅体现了苏州经济活动的地域特征,也反映了历史沿革、产业特色与文化寓意的综合影响。

3.4 彰显义利并举的文化价值导向

发源于江、河、湖、海交汇之地的吴文化,以崇教尚文、开放兼容为核心价值,展现出独特的水乡特质与文化灵性[20]。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体现忠义担当与文化传承的价值观。例如,“胥江街道”“胥口镇”纪念吴国名将伍子胥开挖河道的事迹,“湘城乡”因伍子胥奉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而得名。这类镇名通过伟人事迹体现对忠义精神的推崇。二是反映运河经济与商贸传统的紧密联系,展现儒商文化中“义利并重、重视道义”的特征。例如,“东南街道”纪念孔子七十二贤言偃的功绩,“正仪乡”体现商人重信守义的理念,这些镇名意蕴体现了吴地“商文共生”的文化特色。三是部分镇名在发展中体现现代化追求与文化保护的结合。例如,“古里镇”由宋代菰里村演变而来,明清时期更名以彰显地方德风,“陈墓”更名为“锦溪”以雅化地名,“乐余镇”源于“六圩庄”,寓意快乐有余。这类镇名反映地方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延续与适应,兼顾历史保护与功能发展。总体而言,苏州镇名通过历史沿革、人物纪念与地名雅化等方式,深刻折射吴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内涵及其与时代发展的互动。

3.5 揭示宗姓移民的权力更迭脉络

历史事件和传说是地名的重要来源,即“第三自然”[18]。苏州建城逾 2500 年,镇名深刻反映其历史底蕴[17]。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权倾向与地方治理对镇名的影响。例如,“七都镇”“八都乡”因宋代吴江县行政划分而得名,“城厢镇”源于宋元坊厢制度,“浒墅关镇”原名“虎啸”,因避朱元璋讳改名为“浒”,体现政治权力对地名的直接干预。二是宗族大姓通过地名确立地方势力与忠烈文化。例如,“盛泽镇”因吴江开国伯盛氏家族得名,“周庄镇”因周迪功郎而名,“陆墓乡”“陈墓镇”等通过“墓”字标示家族墓地,遵循宗法制度,同时彰显宗族阶级在地权与地方影响力。三是移民迁徙的痕迹。例如,“梅李镇”因梅、李两姓共居,“董浜镇”因董氏沿河聚居,反映中原士族南迁后的多姓杂居现象。这类镇名通过姓氏标记移民定居点,兼具地理特征与故土认同,体现历史记忆的延续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体来看,苏州镇名不仅记录了政治、宗族与移民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地方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力格局与文化传承。

4 苏州市镇名文化地理特征的形成机理

胡最等[21]、刘沛林和曾灿[22]提出“景观基因组”概念,认为传统聚落由多种景观基因构成,承载关键景观特征与历史文化信息。地名作为地方文化景观的重要表征,可反映特定时期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因而,从地名视角切入,有助于深化区域整体性研究。苏州地处江南水网密集区,历史人文深厚,吴语古音保留显著,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影响因素日益凸显,因此研究其镇名形成机理,对揭示区域文化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4.1 低平地势、丰沛降水的自然本底

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文化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其中自然为媒介、文化为驱动力[23]。自然地理要素构成地名文化基因延续的基础,江苏在水网主导下形成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城乡格局,为苏州水系与地貌塑造镇名提供了典型背景。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太湖流域,地势低平,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地壳缓慢下沉,形成大量洼地,为湖泊发育提供基础。第四纪以来,气候变暖及海侵海退作用促使滞水洼地逐渐演变为内陆湖泊;叠加古太湖与长江水系的变迁、泥沙淤积与水流改道,塑造出复杂多样的水域形态。区域内河网密集,河道逾 2 万条、湖荡 300 余处,水面率约 36.9%,形成“一江、百湖、万河”的水网格局。其中,以太湖为核心水源,吴淞江、胥江、北塘河、横塘河与江南运河、古城河、望虞河等纵横交织,构成“四横三纵”的水系网络,奠定区域水文基础。在此影响下,聚落多依水而生,形成“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空间格局,“斜塘”“横塘”“临湖”“角直”“木渎”等镇名均源于水系形

态。其次，苏州处于冲积平原区，地下水以第四纪松散层孔隙水为主，储量丰富，适宜农业、工业及生活用水，为区域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内河水系由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共同构成，东接长江、西连太湖、南北贯通江南运河，体现出江海联运与内河航运的功能特征，“沙溪镇”“港口镇”“泗泾乡”等地名反映了对水运条件及冲积地貌的利用。此外，区域地貌以平原为主，兼具低山丘陵、湖荡与滩涂。丘陵多为海拔200 m以下的花岗岩、砂岩及石灰岩构成，平原则包括水网平原、圩区平原及湖荡平原等类型。不同地貌特征直接影响镇名形成，如“狮山街道”“东山镇”“凤凰镇”等取名于山体形态；“石公乡”等则结合地貌特征与地方文化记忆。与此同时，部分地名还源于植物与物产资源，体现出自然资源对区域文化与地名体系的深刻塑造。

4.2 工程营构、空间塑造的发展驱动

景观基因理论强调以建筑景观的特征与标志作为识别核心[24]，苏州在水网密布、桥市繁盛及宗教文化影响下，相关要素融入地名体系，进而体现在“关、桥、亭”等空间节点的命名之中。“关”“桥”“亭”分别承担交通调控、网络联通与服务支撑功能，共同构成苏州古代水陆交通体系的关键节点。其中，胥门、盘门等水关兼具调节水位与征税职能；枫桥、山塘桥等桥梁连接水陆交通，提升漕运与商贸效率；唯亭、枕水亭等多设于驿站、桥头及交通交会处，提供歇息与补给服务。“黄桥街道”“浮桥镇”“唯亭街道”等地名，既反映了其在保障运河航运与区域安全中的作用，也记录了筑堤开河等水利开发活动的历史。其次，佛教自东汉传入，隋唐时期兴盛，苏州作为江南重镇，寺庙分布广泛，宗教文化深刻影响地方社会。“双凤镇”“光福镇”等地名融入宗教意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和谐观念；“府前街道”等则体现行政权威，对社会秩序具有规范与约束作用。此外，自春秋以来苏州即为区域政治中心，城门与城墙构成重要的行政与防御体系，胥门、盘门、阊门等既是军事屏障，也是人员与货物流通的控制节点；与之配套的街巷空间，如石路等商业区，承担经济活动功能。“娄葑街道”“石路街道”等地名，反映出城门与街市协同作用，不仅保障城市安全，也通过税收与管理机制促进商业发展与社会稳定。

4.3 经济积累、产业支撑的物质基础

景观基因在稳定传承中亦会随多重因素发生变异[24]。地名作为区域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综合表征，其“经济活动”特征正是多重作用机制叠加的结果[22]，从苏州镇名的形成与演变来看，首先，江南运河自吴江入境，经苏州古城与平江路、胥江等内河水系交汇，北连昆山、太仓并接长江，贯通区域主要空间单元，构建了高效的水运通道。以漕运为核心的水运体系推动了港口、码头与仓储等节点的形成，并带动集镇兴起，“花桥镇”“赵市镇”等地名即反映了漕运经济与市集贸易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其次，苏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网密布，经济林资源丰富，为丝织、木作等产业提供原料基础；同时，依托运河沟通作用，外来铜、铁等资源得以输入，在官府管理下形成“冶塘乡”“木渎镇”等与产业相关的聚落。再次，从时间演变看，“市集”类地名呈现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农业属性为主，60年代逐步服务城市经济功能，现代则直接反映区域发展战略导向，体现不同时期经济重心与发展路径的转变。最后，在“美好祈愿”类地名中，经济发展取向占主导，通过“兴”“丰”等寓意强化发展预期，不仅有助于凝聚地方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振信心与吸引要素集聚的作用。

4.4 吴文化内涵、价值内蕴的文化根基

景观基因理论认为，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情是影响聚落景观形成的主要内容，也是构成传统聚落非物质景观的标志[25]。苏州作为吴文化区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内涵贯穿城市发展，并深刻体现在地名文化中。首先，吴文化发源于太湖流域，春秋时期吴国崛起，阖闾与伍子胥通过城池与水利建设奠定区域发展基础，其忠义精神亦深刻影响后世。如“唯亭街道”（吴王带兵抵御，击退夷兵，遂扎营建亭于今唯亭）、“三元街道”“藏书乡”等，体现了历史事件与文化传统的积淀。其次，苏州历为江南文化重镇，书院林立，人才辈出；科举盛行使书香世家与商人阶层紧密相连，在财富积累后追求文化修养，加之儒家思想长期浸润社会，形成儒商兼备的价值框架。如“枫桥街道”“震泽镇”等，反映吴地社会重义尚礼的价值取向。再次，吴文化崇尚精致典雅，强调审美意趣与文化内涵，在现代化进程中，地名雅化与美化成为提升区域认同的重要方式。如“德积街道”“太平街道”等通过寓意表达发展愿景与价值导向，这在另一方面也延续了吴文化中积极、和谐的精神内核，使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持续传承与彰显。

4.5 南经北政、格局演进的社会动力

Lefebvre[26]指出，空间是权力塑造的社会产

物。苏州历经行政区划调整,其镇名随之演变,不仅反映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文化基因[25],也塑造了社会结构、经济格局及地方文化认同。春秋时期,苏州实行邑、乡制度,秦汉推行郡县制,魏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制,隋唐改为道、州、县三级制,宋元实行路、州、县三级制,并辅以“坊厢”管理,明清则为府、县、乡三级制,“七都镇”“府前街道”等地名体现了地方政治权威和行政结构的稳定性,使地名成为区域政治秩序的象征。同时,受漕运经济、政权重心及江南水乡河湖纵横、土地肥沃等自然条件影响,宗族和豪绅优先占据有利位置,通过干预地名命名巩固归属权,“盛泽镇”“周庄镇”等地名反映士族豪绅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苏州历史上经历多次移民潮:春秋战国吴国兴起吸引周边移民,秦汉战乱促使楚地南迁,东晋南朝中原士族南下,唐代吸纳全国商人和劳力,北宋靖康之变后北方移民南迁,元明清时期作为江南经济重镇继续吸引北方和中部移民。这些移民不仅补充了氏族人口,也推动了手工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王庄乡”“张桥乡”等镇名通过姓氏体现北方文化色彩,揭示了政治迁徙对区域发展的深远影响。整体来看,这些镇名承载历史演变、政治秩序、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信息,同时体现地名命名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现代发展需求相结合,使吴文化在当代社会得以持续传承与彰显。

5 结论

基于地方志等文史资料,并结合GIS技术对显著要素地名进行可视化分析,较为客观地揭示了苏州镇名的用字特征与命名缘由。研究表明:镇名构成呈“一核多元”格局,以水文因素为核心,衍生出建筑交通、经济活动与文化相关等多类型地名;镇名集中体现江南水乡本底特征、桥亭塔门建筑景观、漕运经济传统及吴文化价值内涵;镇名文化地理特征由多要素共同驱动形成,即水网为自然基础,桥梁码头为连接纽带,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吴文化为精神根基,历史事件为社会动力。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苏州部分乡镇面临消失或更名风险,镇名文化呈现弱化趋势。未来需要开展系统性镇名普查,构建分时段地名数据库,完善镇名由来与演变记录;深入挖掘名镇历史文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古镇与文化旅游;强化江南水乡古镇人地关系的典型价值表达。苏州古镇通过水网利用与湿地改造,实现了从农业到商品经济乃至早期工业化的转型,依托水路商贸网络促进城乡联系,形成独特的产业结构与社会组织模式。其依水而建的空间格局与“天人合一”理念相契合,具有重要的文化示范与保护价值。

参考文献

[1] 龚艳,邱素芹. 大运河江苏段聚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化路径研究[J]. 水利经济,2025,43(3):104-111.

[2] 卓甜甜,孟召宜. 徐州市镇名的文化地理特征及其形成机理[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2(3):76-82.

[3] 刘庆果,孙丕苓,王世清,等. 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J]. 山地学报,2024,42(1):108-122.

[4] 赵思文,胡希军,金晓玲,等. 古航道视角下聚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湖南沅水流域为例[J]. 地理研究,2024,43(1):214-235.

[5] 栾桂泽,彭直琰,蔡敬之,等. 地名视角下青海藏族人类活动演变时空分析[J]. 测绘地理信息,2021,46(5):163-168.

[6] 王海燕,李庆雷,王涛,等. 基于GIS的陆良县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空间分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8(2):28-36.

[7] 马仁锋,陈佳锐. 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2022,41(3):764-776.

[8] 蓝勇.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1):166-178.

[9] EHRENREICH-RISNER V. Reading geographical names as text: refiguring the “living archive” in postcolonial South Africa[J]. The American Archivist,2020,83(1):21-56.

[10] 温素平,胡功琴. 近代以来洛阳市老城街道更名的空间政治与传统文化元素演变研究——基于批判地名学视角[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1):128-133.

[11] 罗桂林.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J]. 北京社会科学,2024(5):44-56.

[12] MORIN D. Arabic and cushitic toponymy: one coast with two maps[J].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2012,12(1):217-241.

[13] 周亚,喻磊,岳云霄. 基于GIS的太行山乡村地名文化景观分析——以山西省黎城县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36(8):68-76.

[14] 宋灏岩. 论多元文化背景下澳门地名的中葡文语义差异现象[J]. 中国翻译,2019,40(5):160-166.

[15] 邬志野. 越南建构的南海历史地名叙事及其存在的逻辑问题[J]. 南洋问题研究,2024(2):104-120.

[16] 陈晨,修春亮,陈伟,等. 基于GIS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 地理科学,2014,34(4):420-429.

[17] 梁鑫源,金晓斌,韩博,等. 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景

观多功能性演变——以苏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2021，40(2)：207-219.
[18] 孟召宜，朱传耿. 徐州历史地理特点与地域文化特色研究[J]. 中国名城，2019(1)：61-67.
[19] 周尚意. 地方性对地理标识性产品垄断利润形成的影响——以苏州洞庭碧螺春为例[J]. 地理科学，2015，35(11)：1357-1363.
[20] 孟召宜，苗长虹，沈正平，等. 江苏省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2008(12)：88-96.
[21] 胡最，刘春腊，邓运员，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及其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2，31(12)：1620-1627.
[22] 刘沛林，曾灿. 文化景观基因理论缘起、发展与多学科扩散[J]. 人文地理，2024，39(6)：15-22.
[23] 吴千会. 基于全要素融合的区域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水平评价——以苏南地区为例[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25(1)：66-71.
[24] 李晓颖，张赟乐. 苏南水乡聚落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修复传承研究[J]. 南方建筑，2023(5)：91-98.
[25] 刘沛林，刘春腊，邓运员，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2010，65(12)：1496-1506.
[26]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M]. London：Routledge，2014.

Cultural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uzhou Town Names and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WU Yifan，MENG Zhaoyi

(School of Geography，Surveying and Urban-Rural Planning，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town names of Suzhou by integrating gazetteers，local chronicles and multi-source spatial data was examinat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text analysis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their typological composition，spatial patterns and cultural-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hydrological elements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own naming，while architectural，economic，and historical-cultural factors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a complex and multi-layered structure. Spatially，town names tend to cluster around water networks and extend along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In terms of cultural geography，they embody features of the water-town environment，architectural landscapes，a canal-based economy，Wu cultural values，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clans and migration.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se cultural-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shaped by multiple driving forces，includ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economic accumulation，cultural connotations，and social dynamics，ultimately reflecting notabl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al landscape patterns.

Keywords：Suzhou town names；cultural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spatial distribution；formation mechanisms